



丽娃学术

德语文学符码和 现代中国作家的 自我问题

German Literary Codes and Self-Problematic of Modern Chinese Authors

范劲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丽娃学术

德语文学符码和 现代中国作家的 自我问题

German Literary Codes and Self-Problematic of
Modern Chinese Authors

范劲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语文学符码和现代中国作家的自我问题/范劲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丽娃学术)
ISBN 978-7-5617-6329-2

I. 德… II. 范… III. 德语-比较文学-文学研究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7130 号

德语文学符码和现代中国作家的自我问题

著 者 范 劲
责任编辑 储德天
审读编辑 虞又铭
责任校对 王 卫
装帧设计 储 平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江苏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9.5
字 数 281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
印 数 3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6329-2/I·474
定 价 2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所谓西方影响的经久不衰其实是中国文学主体在持续不断地制造着西方影响……

序

范劲同志从事中德文化和文学关系的研究已经有些年头了。他攻读硕士学位的论文《郭沫若与歌德》，即已开始论及文学接受中的“主体性”问题；博士学位论文又进一步较全面系统地考察德语文学的影响与中国作家的自我意识发展；后来还赴德留学深造，经多年磨砺，终于提供给我们这样一部更有理论深度，更具创造力的优异著作，真令人欣喜。

本书最显著的特点和创造性，在于理论模型设计和方法论上提出了“符码”的命题，而将中德文学关系认定为一个符号学和有关现代性发生的问题。还将有助于重新考察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许多重要现象，自然在比较文学领域也有助于解决文学交流过程中的许多理论问题。例如，以往所谓“外来影响”和主体“创造性转化”的区分，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其实是同一主体的不同表现方式，所谓外来影响只存在于主体内部，他者就是自我，都是主体的象征符号。而且，不仅每一个作家可以作为符号来分层探讨，甚至整个中国文学主体都被赋予了个体性的心理结构，都可当成符号来作结构化分层探讨，这就从集体无意识层面解决了一般读者接受与专家研究及作者的自由联想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种将比较文学结构化和符号化的努力，显然受了拉康心理学和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影响。前者将人的心理进行符号化和结构化处理；后者则把符号学的思路引入了文化相互关系的探讨。范劲把他们两人和其他一些理论家的思想进行整合，引入到比较文学领域，使影响现象的描述结构化和符号化，从而使语言交往无论是在单个作家的作

序

德语文学符码和现代中国作家的自我问题

品内部,或是一个时期的文学整体中的无意识层,都能以言语模式、阐释结构的同构形式体现出来。

这种理论,也许可能影响到比较文学研究的走向,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些难题,如“中国的歌德”、“中国的卡夫卡”,这种比附现象,似乎只是简单地借用“歌德”、“卡夫卡”的专名,有什么相互关系?但是,如果把这种借用看作下意识的符号交换,则显示出其重大的意义,它变成了整个文化运行和文学交流的密码。

文化的创造,既是单个人的,又是地域性的、民族性的,也是全人类的。人类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交换,否则便会丧失创造能力,甚而走向枯竭。现今世界对于“全球化”的憧憬,也令东西文化交流成为近代以来世界舞台最重大、最核心的问题。在这个交流的舞台上,中国文化是一个合格的对话伙伴吗?西方人十分关心,而中国学人也长期受此困扰。中国文化是否丧失了创新能力,只能承受西方的影响?从范劲的这种符号学思路来考察,则可以证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符号吸收能力,正是处于转轨时期现代中国富有活力的体现,它所具有的强大的符号处理能力,也正是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最内在的表现。我们如果再像“文革”时期那样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文化交流的凝滞,带来的便只能是人性和思想的死亡;而坚持改革开放,面向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吸收,带来的正是人性和思想的自由发展,以及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

范劲在珞珈山和我共同学习研讨多年,勤学敏思,留下了深刻印象。几年来不断有成果面世,得到比较文学界一些专家同行的肯定;还担负着有关卫礼贤的中国话语的一项国家课题,大约也临近结题了。加上《德语文学符码和现代中国作家的自我问题》这部著作即将出版,怎么能不令人高兴呢!自然,著作中提出的是新命题,新思路,论述是否完善?有什么不当,甚或错失?我相信作者会欢迎专家同行们批评指正。是为序。

易竹贤

二〇〇八年北京奥运会开幕之日于武昌珞珈山寓所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 1

- 1 第一节 影响的符号化:一种方法论构想
- 13 第二节 德语文学的影响和现代中国作家自我意识的展开

第二章 外来符码与“五四”时代的情感解放 / 26

- 26 第一节 歌德与新时代及新的自我表述
 - 26 一 西方符号与自我展开
 - 32 二 歌德与中西文化融合
 - 37 三 情感的两种表现
- 45 第二节 歌德符码与郭沫若的自我问题
 - 45 一 接受背景
 - 48 二 泛神论和主情主义
 - 61 三 忏悔的暧昧性
 - 65 四 符码的自我消解与意识的转换
- 70 第三节 歌德语义的多种发展可能
- 80 第四节 构成“五四”浪漫精神的其他德语作家
- 88 第五节 尼采与浪漫主义的激进化
 - 88 一 “五四”一代与尼采
 - 97 二 强力意志与民族主义精神

第三章 现代主义与对自我实在性的追求 / 108

- 108 第一节 自我分析的技术:施尼茨勒与施蛰存的心理现实

主义

124 第二节 里尔克与新诗现代化

124 一 里尔克与三十年代的“智性诗学”

138 二 里尔克神话的形成和多重转喻

148 三 里尔克接受与四十年代诗人的社会学转向

156 四 里尔克对“九叶”诗人的影响

163 第三节 里尔克与冯至

163 一 里尔克与冯至的自我问题

172 二 《十四行集》对于自我的探索

184 三 《伍子胥》与“决断”

第四章 虚无的拷问和新时期文学的自我导向 / 192

192 第一节 卡夫卡的漫游轨迹

192 一 “文革”与符号运动

195 二 卡夫卡在中国的升起

200 第二节 “变形”的多重含义

200 一 异化概念

206 二 虚无

212 第三节 潜意识层的符号交换

221 第四节 残雪与卡夫卡

221 一 残雪的卡夫卡阐释

230 二 虚无原则与残雪作品中的自我表达

238 三 阐释的分野:寓言还是“故事”

245 第五节 余华与卡夫卡

260 第六节 文学拼盘中的其他德语作家及新的意识导向

第五章 结语:现代性与符号需求 / 272

后记 / 281

参考文献 / 285

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影响的符号化：一种方法论构想

什么是影响？这在传统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研究中是个最不言自明的概念，以至于人们通常会忽略对这一司空见惯的器具进行反思。可是不应该忘记，忽略了身边最常见的事物也会给自己招来危险，就如那位只顾着看天却跌进了水坑的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所遭遇的那样。也不该忘记，一切真正的智性探求都是起于并最终要归到对身边器具的反思，像海德格尔对“器皿”、马克思对“劳动”、尼采对“游戏”的思考不过是最经典的例子。

在阐述这一概念之前，需要提及它在中国出现的历史语境，以及对我们文艺认识的贡献。其实，不但这一概念的流行开来是同新时期人文科学研究向西方的重新开放相伴的，中国比较文学作为学科的建立也是中国重新同世界接轨的意识形态需要的产物。随着教条禁锢逐渐被打破，人

德语文学符号和现代中国作家的自我问题

们不但意识到引入西方文艺思潮对思想解放和文艺繁荣的重要性,而且开始重新审视“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传统同西方文学的亲缘关系,意识到新文学并不单单是社会政治斗争的反映,而且是融汇了东西方一切文明成果的产物。在“文革”后涌现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第一批研究成果中,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所受西方文学、哲学影响的探讨占了相当的比重。这种影响研究在当时的意识形态环境下具有特别意义,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曾经享有的全方位开放性,无疑可以为新时期的思想界所借鉴,在此背景下,比较文学研究也成为一时的前沿学科。接下来继续繁荣的影响研究则是对作家作品深入研究和日益细致的专业分工的结果,讨论作家和异域传统的关系成为填补作家研究的空白和取得新视角的重要手段,八十年代传入中国的接受美学理论提供的概念术语如期待视野、误读等使这种手段更加精细化。许多文学杂志也都乐于讨论当代知名作家同国外文学的联系,譬如影响很大的刊物《世界文学》在1989年开办了整年的专栏,连续刊载中国诗人、作家对自己喜欢的外国作家的介绍,经典的现代派作家如卡夫卡、博尔赫斯、福克纳等在中国的影响成为公众极感兴趣的话题。在这类场合,影响成了时髦的话题,甚至成了罗兰·巴特讲的“每天的神话”。

然而事物一旦成为神话,它本来的意义就遭到了遮蔽,甚至成了人们力图摆脱的枷锁。这个概念因为其静态的对应结构,在西方早已成为攻击的好靶子。福柯《知识考古学》的理论建构开始于对传统历史学工作方式的批判,按他的说法,就是要摆脱那些以各自的方式变换连续性主题的概念游戏。属于这类概念游戏前列的就有“影响”(第一位则是“传统”),而他嘲讽性的描述甚至比所有比较文学教科书的说法还入木三分:

还有影响这个概念,它为那些传递和交流的事实提供了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如此神妙,以至难以对它加以分析;它把相似或者重复的现象归于一个明显因果性的程序(这个程序既没有严格界定,也没有理论的定义);它在一定距离中和通过时间——正如通过某种传播环境的中介那样——把诸如个体、作品、观念或者理论这些被定义的单位联系起来。^①

①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 by A. M. Sheridan Smith,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p. 21.

这里涉及影响的几个特征：一是信息传递和沟通作为研究的任务，以回应现实世界对理论的期待；二是对相似性的偏爱作为工作方法；三是时空联系的达成作为结果。第一和第三项其实是一切概念的本能冲动，只有第二项是实质性内涵，即“影响”将相似和重复加工为因果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本身只是话语的秩序，而这就意味着并非事物本然，“但是一下就会明了，这样的单位是某种操作的结果，远非是即刻给予的”。^①这一发难确实有它的道理。传统“影响”概念早就在困境中徘徊，困境之所在并不难察觉，看两个例子就清楚了。

作为这种传统用法的代表，约瑟夫·T·肖的《文学借鉴与比较文学研究》精细地分辨了文学借鉴的种种术语：翻译、模仿、仿效、借用、来源、类同和影响，一一加以明确定义，譬如“仿效”（stylization）就是“作家的风格和内容表现出别的作家、别的作品，甚或某一时期的风格特征”，“借用”（borrowing）就是“作家取用现成的素材或方法，特别是格言、意象、比喻、主题、情节成分等”。这些定义无一例外，都要由我们手头的作品来加以回答：

有意义的影晌必须以内在线的形式在文学作品内表现出来，它可以表现在文体、意象、人物形象、主题或独特的手法风格上，它也可以表现在具体作品所反映出的内容、思想、意念或总的世界观上。……为此，各种文献记载、引语、同代人的见证和作者的阅读书目等都必须加以运用。可是，最基本的证明又必须在作品的本身。具体的借用是否表现为影响，取决于它们在新作中的作用和重要程度……^②

先不论这类概念细分究竟能做到多大程度的准确。关键是，被关注的重点其实并不是影响作为事实传递过程本身，而只是影响后形成的结果，这类结果包括像模仿、仿效、借用、类同等等现实文本形态。但认真讲来，影响后的结果作为作品的有机组织却只能属于作品，而不是任何外来的影响者，因为作品本身作为活体是不可拆卸的。严格意义上的

^① Ibid., p. 24.

^② Josef T. Shaw《文学借鉴与比较文学研究》，盛宁译，刘介民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1页；原文见Joseph T. Shaw: “Literary Indebtedness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Method and Perspective*, ed. N. P. Stallknecht and H. Frenz,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P, 1961, pp. 58-71.

德语文学符号和现代中国作家的自我问题

影响只存在于过程中,存在于到达作品前的一刹那,随这一刹那的终结而自动终止。于是他探测“影响”的著名公式依现在的眼光看来,完全缺乏操作的可能。他说:

一位作家和他的艺术作品,如果显示出某种外来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又是他的本国文学传统和他本人的发展无法解释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位作家受到了外国作家的影响。影响与模仿不同,被影响的作家的作品基本上是他本人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具体的细节、意象、借用、甚或出处——当然,这些都包括在内——而是一种渗透在艺术作品之中,成为艺术作品有机的组成部分,并通过艺术作品再现出来的东西。^①

问题是,如何能将外来和传统影响明确区分开来?譬如,由于我在掌握传统文化上的缺陷,我并非从传统而确实是从外部获得了启发,这在移民者后代中不在少数;或者,传统因素虽已植根在我的潜意识中,但却是通过一个外来信号才唤醒了我的注意力;最后,还存在着既非传统亦非异质的“中间地带”,譬如现代汉语语境里“革命”一词,既有古代“汤武革命”的渊源,又是带英语“Revolution”色彩的经日本转来的舶来词。本土/外来二分模式无法处理这些“例外”,因为这种模式受制于僵化的“相似”原则——这种效果同本国传统不同,言外之意是它同外国传统相同,“变异”也不过是走了形的相似。

这种影响的定义应用于实践,后果可想而知。我们来看一篇探讨歌德对“五四”时期中国作家影响的论文,关于庐隐的小说《或人的悲哀》,文章说道:

全篇主要为亚侠致友人 KY(相当于《维特》中的威廉)的书简组成,仅在结尾加了一则“亚侠的表妹附书”,使人想起《维特》中的“编者致读者”;十二月二十五的最后一封信也如维特似的断断续续写了五天;书中也提到一位盲诗人,使人想起《维特》中的荷马。主人公亚侠同维特一样卓有才智,多愁善感,热爱自然,追求个性解放,厌恶社会的虚伪,因此也不容于社会,从日本回来后便绝望轻生,最后投身美丽的西子湖,结束了年轻的生命。把《或人

^① Josef T. 肖《文学借鉴与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译文选》,第270页。

的悲哀》与《维特》对照起来读,可以发现就连文句也有某些相似之处。当然两者仍存在明显差别,如《或人的悲哀》的篇幅小得多,情节未以爱情为主线,主人公亚侠乃是一位女性等等。但尽管如此,两者的亲缘关系仍一目了然。也许正因此,《或人的悲哀》一问世即为某些致力于中德文化交流的人士所瞩目,由汤元吉译成德文,与原文对照着连载在《德文月刊》第一卷第四至第九期上。要不然在众多的中国小说中,一般很难得译载中国作品的《德文月刊》怎么偏偏选中了《或人的悲哀》呢?须知这篇作品本身影响并不大。再则,或人的德文译名作 *Ein Menschenleid*,意为一个人的痛苦或一个人的烦恼,与《维特》的原名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 已有近似;而在《小说月报丛刊》第十八种后面的版权页上,编者为其译了个英文题名为 *The Sorrows of a Certain Youth*,这与《少年维特的烦恼》及其英译名 *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 可就更相近了啊。^①

这里的关键词是“相当于”、“使人想起”、“同……一样”、“亲缘关系”等等。透过这一大通话,给人印象仍然只是:庐隐的作品同《维特》从形式到情调甚至具体细节都很像,她的标题《或人的悲哀》如果改用英文书写则同《维特》连名字也难以区分。这从修辞运用上说,自然颇具有暗示性,但作为一个严格的结论,庐隐受到的歌德影响仍然没有得到确证。

关键在于相似性本身的性质。影响作为相像是直觉性的理解。就像孩子和父母外貌上的相似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血缘保证一样,影响研究最初的激发就是来自于不同文本在主题、风格、技巧上的相似,如果这种相似发生于特定外部环境,比如碰巧两位作者有密切的私交,影响关系就顺势坐实。以上谈庐隐的文章写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刚起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笼罩于这种初步直觉之中并不足怪。比这更高级的,是精神和精神相遇的说法。营造直接联系的环境究竟十分稀罕,所以把影响看作精神联系,一方面是对狭隘的实证研究主题上的扩大,另一方面又是对漫无止境的外部考察的限制与深化。它的潜在逻辑是,

① 杨武能《歌德与中国现代文学》,《读书》1982年第3期。

德语文学符号和现代中国作家的自我问题

外部相似是偶然的,然而思想内部为人类共通。比较文学由法国学派到美国学派的演进就属此一理路,前者坚持直接的影响考证,以保存事实性来保障“科学性”,对后者来说,物质性事实相对于彻底的文学性不过是外部的东西,因此侧重于由平行比较达到对永恒的内在文学因素的认识。通俗地讲,后者就是以神似取代形似。新批评和平行研究也是同一的形式,即人性的同一(和个性的不同一)。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正是基于此,出现了“影响”的畏惧或者蔑视,同一些人津津乐道外国影响正相反,许多作家不愿头上被人轻易安上一个外国老师的记号,因为他们也把影响机械地理解成相似,而这无非是剽窃的代名词。

可是“相似”原则明确划分你我的要求经不起理论反思。古希腊人讲人不能踏进同一条河里,我们又怎能根据相同语词证明影响呢?何况哪里能找到相同的语词呢?即使同一句话在不同语境中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意义,所以德里达会说,同一语词“在法律面前”作为标题和开头语并不是同一意思。^①这正是郭象注《庄子·德充符》所言:“因其所异而异之,则万物莫不异。”反过来,“相似”的方法也无法证明非影响。譬如,如果我把卡夫卡的《中国长城建造时》和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的《中国长城》作为德国文学受中国影响的范例,一定有人摇头。可这一命题为自己找到的辩护理由却绝不会少于对它的怀疑,至少可以这样说:长城作为一个隐喻表现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集体想象,在这里中国文化不是实物而是作为神话在起作用。这又是郭象所谓:“因其所同而同之,则万物莫不同。”个中奥妙是,任一语词中其实都回响着无数声音,来自不同文化空间的无数能指的共戏让人无法分辨何为主调——“中间地带”才是语言的常态。事实上,文学的模仿行动经常以偏离为前提——差异发挥着更活跃的联接作用。翻译中的音意译之争能清楚表明这一点:为什么“扬弃”能取代“奥伏赫变”,“意识形态”能取代“意德沃罗基”成为 Aufheben 和 Ideologie 的标准译法呢,为什么郭沫若泄漏了斯笃姆小说朦胧气氛的“茵梦湖”能胜过地名“意门湖”呢,都是因为意译调动激活了原文背后的深层因素,为此付出的代价——背离原文语音结构——则显得微不足道。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德里

① 参见 Jacques Derrida 在“Before the Law”(in: *Acts of Literature*, New York 1992) 文中对于“在法律面前”这一短语在卡夫卡同名寓言中不同位置上的语义转换的精彩解读。

达将他全部理论建立在翻译不可能的基础上,由同音异形字的不可译出发,他将人类文明起源定在“巴别塔”——作为不可译的象征——和由此引发的“偿债”义务上。^①而这一摆脱相似性的趋势又可以说始于本雅明,《译者的任务》蕴含的革命性就在于,它越出了原文/译文的框架来思考问题,翻译不要复制原文,而是要实现其来世生命,帮助它向居于上帝的记忆王国的“纯语言”超越。我们应该清楚,原文和译文正是最纯粹意义上的影响和接受关系。

相似性的影响的困境,也即传统形而上学的困境。当代理论的认识路线其实是建立在“差异”原则上,不管是较早提及的能指的游戏,还是后来为后殖民主义所强调的“中间空间”(in-between space)与“两可”(hybridity)原则,或是巴赫金铸造的“狂欢节”概念,以及女权主义者独特的反抗方式,都是这一精神的体现,更不用说利奥塔把差异(而非共识)当作科学的唯一追求和根本动能。相似原则其实就是形而上学的“符合”观念。原文可对应于形而上学的概念,译文就是释义,但并不像僵化的形而上学者想象的,得到了准确释义,就得到了本质,因为概念本身也不过是本质的象征或隐喻,释义最深层的目的应该是激活概念下面蕴蓄的深广的象征资源。福柯针对的连续性也就是这种相似或同一性,他对堂吉诃德的阐释,可以算是当代理论对于相似性的质疑的总结。堂吉诃德是一个细长而孤独的流浪符号,“他是关于‘同’的英雄。”这个符号希望在物的世界中得到印证,但不断被拒绝,被无情地抛回到自身的范围,因为它遵从传统实证主义的行动方式,它的命运标志着相似性与符号的古老协定的结束:

他的整个旅程就是寻求种种相似性:最细小的类比也被当作昏睡的符号而引发(这些符号是必须被唤醒的,以使它们再次开口讲话)。以不可觉察的方式,即畜群、女仆和客栈类似于城堡、夫人和军队,因而畜群、女仆和客栈再次成了书本的语言。这是一个总是未能实现的相似性,因为它把所要寻求的证明变成了嘲讽,并使

① 参见德里达 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 *Critical Inquiry* 27, Winter 2001。无论德里达还是德·曼都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即翻译就是偿债,是语言向更高级的“纯语言”领域超越的内在需要,这个超越通过向别种语言转换而发生,但这个目的永远不可能真正实现,所以德·曼把本雅明《译者的任务》读作“翻译者的失败”,详见其“Conclusion” Walter Benjamin’s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Yale French Studies*, No. 69, 1985。

德语文学符号和现代中国作家的自我问题

得书本的言语永远空洞无物。^①

但仅知道同异的相对性,我们还没有越出古代辩者的水平,并没有知“道”。似和不似的确定本身毫无意义,作为人为建立的关系,似又如何?不似又如何?除非进入一个更开阔深远的空间,才能摆脱这一麻烦。传统影响研究引入美学之维来确定研究的意义:“在理解和评价一部作品时,不但要将它置于文学传统中,而且要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说明它要达到的目的以及它的成功之处在哪里。要做到这些,直接的文学关系和文学借鉴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②这个说法其实没有实质性内容,因为美不是靠解剖术发现的,什么作品是成功的,由作品本身已经决定了,比较文学的解剖并不能发现其中的秘密。这正是前面讲的“神似”的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软肋所在,它取消了实证主义者具体的对应,代之以“人性”、“文学性”作为抽象媒介,却没有增加任何实在的益处,因为文学作为人性的表达与共通只是过于自明的道理,而如何才能更人性(更文学),并不取决于某一学科的专业性要求。可是,它暗示了超越的需要,暗示我们将注意力从僵死的事实对应移向别处。

事实上影响的事实并未湮灭,并且始终是比较文学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乌尔利希·魏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所谓“比较文艺学的关键概念”。^③谈弗洛伊德对心理分析学科的作用时,福柯说,弗氏建立了一种话语模式,在他划定的场域上,盘绕他所铸造的基本参照构架,林林总总的心理分析话语得以滋生蔓延。^④这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在描述影响。败坏这个概念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忽略了“回应”之于“影响”的义务,我们把“接受”看成受影响,却把“回应”不看成受影响,从而错过了影响的本质,因为影响作为真理信息的发射,其命运只在于对回应的期待(尽管无处不感到失望)。这种回应最极端的形式就是走到影响者对立面,但对立并不等于拒绝。对于影响发射的信息 + A,最极端的

① 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3页。

② Josef T. 肖《文学借鉴与比较文学研究》,第123页。

③ Ulrich Weisste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trans. by William Riggan, Bloomington & London: Indiana UP, 1973, p. 29.

④ Michel Foucault: Was ist ein Autor? übers. von Hermann Kocyba, in: *Schriften zur Literatur*, Frankfurt a. M.: Suhrkamp 2003, S. 252.

回应是其对极 - A, 而非“非 + A”。“非 + A”乃是不回应和避开, 而 - A 却是由 + A 本身所引发, 在否定意义上表达和延续了 A 的生命, 也就是本雅明的原作之来世生命 (Nachleben)。实际上, 一个仅限于模仿的借鉴仍滞留于自我当中, 真正的影响在于作品被摄入了他者的作用场, 被逼迫着运用自己全部的认识资源去作交代。作家倍感欣慰的“摆脱了某某人影响”, 也许正意味着进入了深层次交流, 化成血肉的影响周流于全身, 以致失去了可分辨形态。这就如陈平原注意到的, “五四”一代的大学生如傅斯年等, 成名后不愿谈及章太炎, 却正因为对其用力过深之故。^① 这样来理解, “掌握”不过意味着扬弃, 如拉康说的: “你要与之作战的那人正是你最欣赏的。理想的自我就是……你须要杀死的”,^② 父亲作为超我的影响只在肉身消失后, 在对死者的追忆与葬礼的哀仪中才能显出。反之哈姆雷特担心将猥琐的僭主克劳狄斯杀死, 反而会造就一个强大的存在, 虚拟的父亲颠倒为了真正的权威。所以, 描述影响需要引入否定的意识, 比较文学亦应转向对差异互戏的关注。

具备了否定意识, 我们就要引入游戏与符号的观念。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的比喻表达了一种新的阐释原则。《哲学研究》一开始就是对奥古斯汀的反驳, 说语词不光是一个命名或指称, 不光是用来指外在事物的无谓称呼——这种指称观念正是“相似”的影响概念的基础。在传统语言观下, “每个词语都有一个意义。这个意义从属于该词语。它是该词语所负责的对象。”^③ 但是从语言游戏角度, 意义只在于具体运用, 某一意象、观念或人物形象的意义取决于在使用语境中的功能需要, 而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固定内涵即所谓本原意义。游戏思想作为跨文化转移和影响研究的指导原则, 将迫使我们进入每一具体历史语境, 考察影响发送者在具体场景下和其环境所发生的关系, 探询这一次影响作为一个具体的、一次性的、不可逆的语言游戏的规则和目的。

这个原则又要同符号观念相结合。德语区比较文学特别重视的形象学 (Imagologie) 可说是对法国和美国学派某种程度上的综合, 影像

① 陈平原《知识生产与文学教育》, 《文学评论丛刊》第9卷第1期(2006), 第25—26页。

② Jacques Lacan: *Desire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esire in Hamlet*, trans. by James Hulbert, *Yale French Studies*, No. 55/56, 1977, p. 31.

③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trans. by G. E. M. Anscombe, Oxford: Blackwell, 1963, p. 1.